



中国学术档案大系

主编 陈文新



《金瓶梅》学术档案

王 炜 编著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金瓶梅》学术档案/王伟编著.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2. 11
中国学术档案大系/陈文新主编
ISBN 978-7-307-09685-1

I. 金… II. 王… III. 《金瓶梅》—文学研究 IV. I207.4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63264 号

责任编辑:朱凌云 李 炜 责任校对:黄添生 版式设计:马 佳

出版发行: 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 cbs22@whu.edu.cn 网址: www.wdp.com.cn)

印刷: 武汉中远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20 × 1000 1/16 印张: 27.25 字数: 405 千字 插页: 2

版次: 2012 年 1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7-09685-1/I · 533 定价: 56.00 元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凡购我社的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目 录

金学百年概览	王 炜 (1)
中国小说史略·明之人情小说(上)	鲁 迅 (20)
划分类例,建构统系	
——鲁迅的《金瓶梅》研究与现代学术范型的建立	(26)
谈《金瓶梅词话》	郑振铎 (37)
文本批评的滥觞	
——郑振铎《谈〈金瓶梅词话〉》导读	(54)
《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	吴 晗 (63)
历史考证法与文学社会学	
——吴晗研究《金瓶梅》的路径、视角及学术取向	(99)
《金瓶梅词话》中的文学史料【存目】	冯沅君 (116)
小说中的戏剧史料与小说史料学	
——冯沅君的《金瓶梅》研究及其影响	(116)
中国古典小说·金瓶梅【存目】	夏志清 (128)
“优美作品之发现与评审”	
——夏志清的《金瓶梅》研究	(128)
金瓶梅的艺术【存目】	孙述宇 (141)
“不存成见”的阅读	
——孙述宇《金瓶梅的艺术》导读	(141)
《金瓶梅》的写定者是李开先【存目】	徐朔方 (173)
《金瓶梅》的成书性质	
——徐朔方《〈金瓶梅〉的写定者是李开先》导读	(173)
《金瓶梅》与古代世情小说	黄 霖 (186)

世情小说的典型特征是“写时俗”、“重人情”

——黄霖《〈金瓶梅〉与古代世情小说》导读 (196)

人情小说审美规范的确立 陈文新 (210)

辨体意识与会通精神

——从《人情小说审美规范的确立》一文透视陈文新的治学理念
..... (228)

《金瓶梅词话》的版本与文本 梅 节 (241)

对传统校勘学的承继、宏扬和完善

——谈梅节的《金瓶梅词话》校勘 (260)

1980年后《金瓶梅》研究论著知见录

..... 胡 睿、王 炜、董妙妙 (272)

百年金学大事记 王 炜、田明珍、赵炜霞 (331)

金学百年概览

《金瓶梅》自问世以来，众说纷纭，毁誉参半。百年来，学人就《金瓶梅》展开了深入、系统的研究。目前，学界的重要任务是：从学术史着手，对百年里的《金瓶梅》研究展开厘剔工作，有效地借鉴已有的成果，进而寻求《金瓶梅》研究的新观念、新方法。本文结合《〈金瓶梅〉学术档案》收录的相关内容，分别从纵向的时间流变和横向的治学路向两个维度着手，梳理百年来《金瓶梅》的研究状况。

一

进入 20 世纪，中国知识体系、学术统序逐渐由传统向近现代转型，小说的地位迅速提升，《金瓶梅》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在这百年的时间里，金学的发展、演变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传统向近现代的转型期（1911—1948 年）、学术研究的自我确认期（1949—1978 年）、发展与繁荣期（1980—2010 年）。

1. 《金瓶梅》研究与学术体系的近现代转型（1911—1948 年）

从 1911 年到 1948 年，《金瓶梅》研究处于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期：学界由着眼于这部小说自身的存在状态，进而开始关注《金瓶梅》与其他学术要素，以及与社会政治、文化等各类要素之间的关系。

1911 年，钝宣在《国粹学报》上发表《小三吾亭随笔》，谈及满文《金瓶梅》。钝宣说，满文《金瓶梅》“全用满文，惟人名则旁注汉字”，“翻译出户部郎中和素之手”。^① 钝宣从静态的层面上，描

^① 钝宣：《小三吾亭随笔》，载《国粹学报》第 7 年第 1 号。

述满文《金瓶梅》的基本状貌及译者等情况。到了1914年，梦生的《小说丛话》开始将《金瓶梅》与同类型的书籍《水浒传》、《红楼梦》等进行比较：“《水浒传》写豪杰义气，《红楼梦》写儿女私情，《金瓶梅》则写奸盗邪淫之事，故《水浒传》、《红楼梦》难读，《金瓶梅》尤难读。”^①梦生关注的是《金瓶梅》这一知识要素与同类型的其他个别知识要素之间的关联。在此基础上，梦生继而将阅读、理解《金瓶梅》与认识现实人生联系起来：“能读此三书而能大彻大悟者，便是真能读小说书人，便是真能读一切书人。”^②此后，在《金瓶梅》研究中，学者开始多方位地考察这部小说与其他类型的知识要素之间的关联：1917年，陈独秀谈到《金瓶梅》说，这部小说无微不至地描写了恶社会，这涉及小说与时代政治、文化之间的关联关系。也有学者在文学这一类知识要素的整体架构下考察《金瓶梅》：如，1924年，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将《金瓶梅》放在中国小说发展的线性流程中予以观照。鲁迅指出，《金瓶梅》是人情小说，这是将《金瓶梅》放在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整体流程中对之进行定位。另如，1927年，茅盾将《金瓶梅》置于中国性文化的发展流变中，他说：“宋以前性欲小说大都以历史人物（帝皇）为中心，必托附史乘，尚不敢直接描写日常生活……直到《金瓶梅》出世，方开了一条新路。”^③茅盾还将《金瓶梅》放在中西文学比较的视野中，他说，《金瓶梅》“意在描写世情，刻画颓俗，与《漂亮朋友》相类；其中色情狂的性欲描写只是受了时代风气的影响，不足为怪”^④。从钝宦到陈独秀、鲁迅、茅盾，我们可以看到，学界对《金瓶梅》的研究从传统向近现代的转型过程：由关注小说包含静态的、稳定的要素，转向探寻作品动态的存在状貌，寻找作品与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层面的多重关联关系。

① 梦生：《小说丛话》，载《雅言》1914年第7期。

② 梦生：《小说丛话》，载《雅言》1914年第7期。

③ 茅盾：《中国文学内的性欲描写》，载《小说月报》1927年第17卷号外《中国文学研究》。

④ 茅盾：《中国文学内的性欲描写》，载《小说月报》1927年第17卷号外《中国文学研究》。

1931年，万历刻本《金瓶梅词话》被发现；1933年，“古佚小说刊行会”影印出版《金瓶梅词话》。这更进一步激发了学者们的研究热情，促成一批重要的金学成果的诞生。其中，代表性的论文有：吴晗的《〈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涩斋的《金瓶梅词话里的戏剧史料》、张天畴的《金瓶梅词话里的帮闲人物》、郑振铎的《谈〈金瓶梅词话〉》、冯沅君的《〈金瓶梅词话〉中的文学史料》、孟超的《金瓶梅人物小论》等。其中，吴晗的《〈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一文，将《金瓶梅》的作者、著作时代、社会背景等的研究融汇于一体。吴晗在研究中，将传统学者的辨“伪”作为学术活动的起点，在推断出“《金瓶梅》非王世贞所作”后，吴晗搁置了作者的问题，转而探讨《金瓶梅》的成书时代。在确定《金瓶梅》成书年代的基础上，吴晗又进而讨论《金瓶梅》这部小说与社会风气之间的互动关系，分析《金瓶梅》所反映的时代特征。这样，吴晗由传统治学中纯粹的考证入手，进而将静态地描述、动态地梳理等各种研究理路和方法融于论文之中，在广阔的视野下对《金瓶梅》进行多角度的考察。郑振铎的《谈〈金瓶梅词话〉》是《金瓶梅》文本批评的滥觞之作。郑振铎认为《金瓶梅》是写实小说，郑振铎结合版本、作者及成书年代等，分析《金瓶梅》的主题、人物形象等，揭示小说思想内涵与社会经济、政治之间的内在联系。在《金瓶梅》研究史上，《〈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和《谈〈金瓶梅词话〉》标志着近现代治学方法的定型。

20世纪上半期，《金瓶梅》研究路向的这一调整，正直接参与了中国知识体系、学术体系的近现代转型。中国古代自有一套完整、成熟的知识统序，这种知识统序“乃经籍之统系”^①，即对知识的归类以知识的载体——书籍为中心。书籍被分成经史子集四部，某一部书籍以及这部书籍相对应的知识，能而且只能被归于一个部类。知识的归类具有稳定性、静态性，甚至是唯一性。与这种知识分类统序相应，传统的治学方法重知识的辨伪，重书籍版本的发掘。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知识体系的建构模式开始调整，学界不仅仅关

① 顾颉刚：《古史辨》第1册，朴社1926年版，第29页。

注知识的静态存在，而且开始重视不同类型的知识之间复杂的关联关系，着手探寻知识的动态性、丰富性。这样，学者的治学理路也随之转变。学界在重文献考证、版本校勘的基础上开拓出新的研究范式：剖析某一知识要素与其他领域的多重关联关系，发现知识要素在不同的关系结构中生成的多元化的意义与价值。中国学术进入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期。20 世纪上半期，学者在深入、系统地探查《金瓶梅》的作者、成书年代等问题的基础上，由传统学者关注本事、确证小说与现实的直接对应关系，转向剖析人物形象、考察作品反映的时代文化特征，推动了《金瓶梅》研究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

20 世纪上半期，国外汉学界，特别是日本学界对《金瓶梅》展开了深入的研究。日本学者池田桃川、井上红梅、长泽规矩也、山中鹰夫、麻生矶次等探讨了《金瓶梅》的版本、思想内容等。1948 年 8 月至 1949 年 5 月，日本东京东方书局出版了杂志《金瓶梅》。该书共四册，收录了千田九一的《向密林挑战的精神》、荒正人的《色情和文学》、小野忍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和〈金瓶梅〉》及《〈金瓶梅〉的色情描写》、仁井田升的《〈金瓶梅〉和社会的制约》、长泽规矩也的《〈金瓶梅〉和明末的淫荡生活》等论文。

2. 关于《金瓶梅》的论争与学术研究的自我确证（1949—1978 年）

20 世纪中后期，中国大陆《金瓶梅》研究的一个突出特点是：由 50 年代及 60 年代初的激烈论辩，转向 60 年代中期以后的集体沉默。从 1954 年到 1964 年，学界就《金瓶梅》的成书、性质及创作倾向等问题展开了三次论争。1965 年到 1978 年，《金瓶梅》研究完全处于沉寂状态，除游国恩的《中国文学史》等零星地论及《金瓶梅》外，未见有关于《金瓶梅》的专门研究。总体来看，1949 年至 1978 年，学界就《金瓶梅》的性质、定位展开的论争，以及对《金瓶梅》研究的搁置，均与中国学界，乃至中国整个社会处于自我确认阶段紧密相关。

学界就《金瓶梅》展开的第一次论争，发生在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这次论争的焦点是，《金瓶梅》是不是集体创作。1954 年，潘开沛发表《〈金瓶梅〉的产生和作者》一文。潘开沛提出，《金瓶梅》

是“一部集体的创作”。^①《金瓶梅》“不是像《红楼梦》那样由一个作家来写的书……它不是哪一个‘大名士’、大文学家独自在书斋里创作出来的，而是在同一时间或不同时间里的许多艺人集体创造出来的……只不过最后经过了文人的润色和加工而已。”^②1955年，徐梦湘发表文章对潘开沛的“《金瓶梅》集体创作说”提出质疑。徐梦湘指出，《金瓶梅》完全是“有计划的个人创作”。^③《金瓶梅》被称为“词话”，其中又多说话人的语气和词曲，这是因为小说作者有意在模仿平话。1958年，张鸿勋撰文，支持徐梦湘的“个人独创说”。张鸿勋说，《金瓶梅》“全是作者一个人规划，一个人的创作”。《金瓶梅》中的确有一些“旧有的材料”，但这只证明，作者“部分地引用了别人的材料”。《金瓶梅》不像《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那样，“根据旧有的流传数百年的民间传说、故事或话本增补改编写成”，《三国演义》等小说的作者“只能算结集者或加工者”。《金瓶梅》则是“现存中国古典长篇小说中，知道是个人创作的第一部”。^④20世纪50年代，整个社会强调、重视集体的力量，如农业领域进行合作化运动、工商业领域展开了各类改造活动，在学术领域，潘开沛提出的“集体创作说”与50年代整个社会的思维模式以及政治、文化情势正相呼应。从学术自身发展的理路上看，“《金瓶梅》是集体创作”虽未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定，但是，却为学界认识《金瓶梅》，乃至明代章回小说的成书过程开启了新的思路。50年代中期的这次论争，为后来学界探讨中国古代长篇白话小说的特征奠定了基础。经过这场争论，到了21世纪，学界普遍认为，明代部分小说具有集体编著的性质；无论是个人独创，还是集体编著，都丝毫不

① 潘开沛：《〈金瓶梅〉的产生和作者》，载《光明日报》1954年8月29日。

② 潘开沛：《〈金瓶梅〉的产生和作者》，载《光明日报》1954年8月29日。

③ 徐梦湘：《关于〈金瓶梅〉的作者——潘开沛〈金瓶梅的产生和作者〉读后感》，载《光明日报》1955年4月17日。

④ 张鸿勋：《试谈〈金瓶梅〉的作者、时代、取材》，载《文学遗产》1958年增刊。

损于小说作者个人的创造性成就。

学界就《金瓶梅》展开的第二次论争，发生在1957年。这次论争的焦点是，《金瓶梅》是不是现实主义的代表作。李长之发表《现实主义与中国现实主义的形成》一文，探讨《金瓶梅》的性质以及这部小说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李长之提出，“《金瓶梅》是严格的现实主义出现的标志”。《金瓶梅》这部小说“对现实不存在任何幻想，不加任何粉饰，而是忠实、大胆地在揭露现实”，“是现实主义在中国质变的标志”。李长之还指出，现实主义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现实主义“是指特定的历史阶段的产物。……作为一个流派看，它能够鲜明地区别于浪漫主义流派的作品”。李长之说，从中国文学的发展流程来看，“广泛的现实主义开始于《诗经》”；狭义的“现实主义的准备阶段始于中唐”^①，最终发展成熟、完善则在《金瓶梅》。李希凡发表《〈水浒〉和〈金瓶梅〉在我国现实主义文学发展中的地位》一文，反驳李长之的观点。李希凡说，《金瓶梅》的作者“津津有味地爱抚地描写”西门庆等人的堕落生活，这“抵消了它在反映生活逼真描写上的意义”。“与其说从《金瓶梅》开始，是严格的现实主义的标帜，不如说，中国古典小说发展到《金瓶梅》时代，正在经历着深刻的分化过程”，“《金瓶梅》一方面是使现实主义向前发展了……为现实主义文学出现像《红楼梦》那样的伟大杰作作了准备”，一方面“却在文学的基本倾向上，离开了现实主义，走向了客观主义”。^②李希凡提出，《水浒传》才是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将李长之、李希凡的论争置于中国文学学术史的发展流程中，可以看到，这次论争的实质是，学界有意识地、系统地引入并化用西方的文学概念、观念和方法，发现和总结中国文学发生、发展的规律，认知和确证中国自身的文学传统。

第三次论争的焦点是，《金瓶梅》的作者是否站在“人民立场”

① 李长之：《现实主义与中国现实主义的形成》，载《文艺报》1957年第3期。

② 李希凡：《〈水浒〉和〈金瓶梅〉在我国现实主义文学发展中的地位》，载《文艺报》1957年第38期。

上。20 世纪 60 年代，张德顺、刘秀身等 4 名中文系学生就《金瓶梅》的创作倾向，与任访秋展开了论争。另外，就《金瓶梅》的成书时代，学界还有一次跨时间的争论。1962 年，龙传仕发表《金瓶梅创作时代考索》一文，该文逐条反驳了吴晗在 1934 年提出的观点、看法，否定吴晗提出的《金瓶梅》成书于万历年间的说法。

20 世纪中期的这几次论争，从表面上看，是讨论《金瓶梅》的成书方式、创作倾向等，但就其根本，则围绕着“是”与“非”的问题而展开：《金瓶梅》是不是集体编著，是不是现实主义的标志，作者是不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学界试图对《金瓶梅》研究中的相关问题做出明确的、非此即彼的判定。学界的这种治学观念和态度与文学学科的发展、演进相关，也与社会政治体制的建构有极其紧密的关联。从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上看，20 世纪五六十年代，文学学科需要一套明确而稳固的概念、范畴和价值评判标准。这是因为，20 世纪初，“文学”学科之名虽已立，学科之实仍未备，学界围绕着文学的本质、范畴、核心要素等问题，进行了协商；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讨论，学界需要而且也应该形成较为稳定的标准和观念，以明确地认证“文学是什么”。《金瓶梅》研究界通过激烈的讨论，确证《金瓶梅》的性质，正与文学学科在特定时段内的需要相关。此外，从社会政治形态上看，50 年代，新的政治构架刚刚建立，政体也需要建构一套自身特有的思维体系、价值观念、政治意识形态乃至文化发展方向等，对相关问题展开对与错、是与非、好与坏的明确界定，无疑有助于迅速建构起“独有的”社会价值体系。学术作为社会意识形态建构的重要部分，自然会参与到这一价值重建的进程之中。学界围绕《金瓶梅》而展开的论争，正反映了学术、政体，乃至整个社会重新建构、确立全新的价值体系的要求。

自 1965 年到 1978 年，《金瓶梅》研究是一片空白。这与学术自身的特性与发展逻辑不无关系。从学术发展上看，在特定阶段，学界需要确定一套明确的、稳定的概念和范畴。但是，人文社会学科与自然科学学科不同，特别涉及文学学科，文学本身是一个不断建构的、动态的存在，文学学科研究的对象——文学作品看似稳定的，但随着研究者观察视角的变化，对作品的解读却是千变万化的。对文学的认

知和理解无法像数学、物理学、化学等那样用确定的数字进行度量，给出标准化的答案。具体到《金瓶梅》，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部充满了内在张力的小说，文本内部蕴含、混合着多元的要素。这些要素不能协调统一，甚至是相互矛盾、相互牴牾，要就这一文本的性质做出“是”与“非”的明确判断，无疑与文学的本质、与《金瓶梅》的特质是背道而驰的。学术研究对稳定性的需要与文学自身的动态性之间存在矛盾，学界无法弥缝、协调这一矛盾，只有搁置对《金瓶梅》的研究，集体保持沉默。此外，政治意识形态也是造成《金瓶梅》研究处于空白期的重要原因之一。从政治意识构架来看，自1966年至1978年，建构稳定的价值体系的要求与价值观念自身的多元化之间也产生了具大的矛盾，整个社会的自我需要和自我认知无法达成统一，处于躁动、焦虑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学界无法正常、有序地展开学术研究。再加上《金瓶梅》这部小说缺乏“光辉的正面形象”^①，包含着大量的情色描写，这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社会价值观念构成尖锐的冲突。学者认识到，任何对《金瓶梅》的正面的、肯定性的评价都会遭到驳斥、反击，而对这部小说给予完全否定性的评价又与事实不符，因此，学者大都放弃了对《金瓶梅》的研究。20世纪中期，学界面对《金瓶梅》的“失语”，正反映了中国近现代学术体系，乃至政治体制进行自我确定、自我认证过程中的焦虑、困惑以及艰辛。

1949年至1978年，中国港、台地区及国外学界也展开了对《金瓶梅》的研究。中国港、台学者刘师古从社会文化的层面展开对《金瓶梅》的研究，讨论了《金瓶梅》反映的人性、小说中涉及的性爱与淫具等；孙述宇从文本细读的角度出发，对《金瓶梅》的内涵以及人物形象做了精到的剖析。日本以及欧美学者对《金瓶梅》的版本研究成果卓著，对《金瓶梅》的思想内涵及美学价值的研究也颇有斩获。1963年，日本大安株式会社影印出版了《新刻金瓶梅词话》，并出版了《金瓶梅特集》研究专号、《金瓶梅论文集》等，汇

① 张德顺等：《为什么要如此推崇〈金瓶梅〉》，载《开封师院学报》1964年第2期。

集了日本学者鸟居久晴、长泽规矩也、小野忍、饭田吉郎、太田辰夫、清水茂、池本义田、阿部泰记等的重要成果。美国学者韩南的《〈金瓶梅〉的版本及其他》、《〈金瓶梅〉探源》对《金瓶梅》的考证慎微谨严。此外，英国的阿瑟·戴维·韦利和前苏联的马努辛也推动了《金瓶梅》研究的国际化。

3. “金学”与学术研究的发展、繁荣（1979—2011年）

从1979年到2010年的30余年中，大陆学界一改20世纪中期的沉寂，开始运用各种新方法、新观念对《金瓶梅》展开系统而深入的研究，《金瓶梅》研究呈现出繁盛的态势，更有学者将《金瓶梅》研究称为“金学”^①。

1979年，《社会科学战线》连续刊载了朱星的三篇文章，打破了《金瓶梅》研究的沉寂。这三篇文章是《金瓶梅的版本问题》、《金瓶梅的作者究竟是谁》、《金瓶梅被窜伪的经过》，分别讨论了《金瓶梅》的版本、作者以及内容等。朱星认为，《金瓶梅》的作者是王世贞，《金瓶梅》原本没有“秽语”，所有的“秽语”都是改编者后加的。虽然关于《金瓶梅》的作者至今仍无定论，朱星提出《金瓶梅》原书中并无秽语，也被其他学者批评为论据不足，纯属臆测。但是，朱星率先打破《金瓶梅》研究的沉寂状态，开启20世纪后期《金瓶梅》研究的先声，朱星文章及论著在百年金学史史上仍具有标志性的意义。之后，学界围绕《金瓶梅》的版本、作者等问题展开了讨论，主要有黄霖的《〈金瓶梅〉原本无秽语说质疑——与朱星先生商榷》、赵景深的《评朱星同志〈金瓶梅三考〉》、张远芬的《新发现的〈金瓶梅〉研究资料初探——兼与朱星先生商榷》等。20世纪80年代，学界发表的论文逾400篇，大都围绕着《金瓶梅》的作者、版本、社会意义和价值等展开讨论。从研究视角以及学术观念上看，这些文章并未完全跳出1949—1978年学界论争的范围，但是，从中国文学学术史上看，这一时期涌现出的论著、论文形成了学术话语力量，再

① 魏子云著《金瓶梅审探》一书由中国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董庆萱为该书作序说：“继‘红学’之后，‘金学’也逐渐热闹起来。”此后，“金学”之称遂广泛流行开来并被学界认可和接受。

次确认了《金瓶梅》在中国古代长篇白话小说史上的经典地位。

20 世纪 80 年代，金学界还积极、广泛地开展学术研讨活动：1985 年、1986 年在徐州召开的第一届及第二届全国《金瓶梅》学术讨论会、1988 年在扬州召开的第三届全国《金瓶梅》学术讨论会，推动了金学的发展。在这 10 年间，《金瓶梅》研究的热潮还影响、扩展到社会各个层面，戏剧、影视界也纷纷对《金瓶梅》进行改编，将之推向银幕和舞台，《金瓶梅》的阅读、传播表现出多向度、大众化的趋向：1984 年，吉林省京剧院推出了京剧《金瓶梅》；1985 年，魏明伦编川剧《潘金莲》上演，川剧《金瓶梅》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反响，吴祖光、巴金、萧乾、陈白尘以及姚雪垠、林默涵、贺敬之等就川剧《金瓶梅》的意义与价值展开了激烈的论争；1986 年，吉林省拟开拍电视剧《金瓶梅》，并完成 40 集共 64 万字的《金瓶梅》剧本。

1990 年至 1999 年，研究者继续就《金瓶梅》的作者、版本、内容等展开探讨，同时，也大量运用新方法，站在新的视角上多方位地考察《金瓶梅》。这 10 年里，学界的突破点主要有三：一是学者开始正视《金瓶梅》中的性描写；二是研究者多视角地认识、剖析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体察人物形象所体现出的悲剧性色彩，而不仅仅是将西门庆等作为负面形象进行批判；三是学界运用多学科交叉的方法，对《金瓶梅》展开研究。首先，关于《金瓶梅》中的性描写。1927 年茅盾撰写《中国文学内的性欲描写》一文，直接地、正面地讨论了《金瓶梅》中的性描写。之后的半个多世纪里，学界对《金瓶梅》中的性描写或加以批驳，或视而不见，甚至否认《金瓶梅》原书中存在性描写。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学界开始正视《金瓶梅》中的性描写。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张国星的《性·人物·审美——〈金瓶梅〉谈片》一文。张国星提出，“《金瓶梅》中的性描写，是笑笑生刻画人物性格心理、构架人物命运、完成其艺术目的的重要之笔，反映着作家的文化—艺术观念，是小说不可阉割的有机成份”。“性爱情欲是正常人的正常存在，文学作品涉笔于此并不是‘淫’。”“现实生活中存在着性暴力、性倒错、性变态”，文学作品可以正视这些现象，不必对之讳莫如深。张国星还谈到，“艺术批评只

能是审美的衡量，而不充任宗教裁判所式的道德法官，以简单的道德判断代替复杂的美学批评，以形象的道德属性否定其审美价值”^①。也有学者从叙事学出发，考察性描写在《金瓶梅》中的叙事功能：性描写在形式上“作为叙事框架构成的视角因素，扮演着统摄、观照全书人物与情节的重要作用”；“性描写作为叙述视角，具有极强的形式动力，参与构筑着小说整体的叙述方式、形态、风格”；“性描写作为叙述动力，推进着故事情节和人物性格的发展，从而成为小说叙事构成的内在组织”。^② 其次，关于《金瓶梅》的悲剧情蕴。学界出版了大量论著，如，王志武的《金瓶梅人物悲剧论》剖析了《金瓶梅》中人物的悲剧性，王汝梅主编的《金瓶梅女性世界》描述了小说中女性的生存境况。再次，学界就《金瓶梅》展开了多学科交叉研究。有学者从语言学的角度考察《金瓶梅》中的词汇，也有学者从医学的角度考察《金瓶梅》中反映出的医药史等。

进入21世纪，《金瓶梅》研究在已有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与拓展。这一时期，《金瓶梅》研究的特点是：（一）围绕《金瓶梅》展开的论争渐渐降温，学者在研究中，大都搁置《金瓶梅》的作者问题。（二）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新方法、新视角运用得更加娴熟。（三）学界开始对以往的研究观念、学术理路等进行反思与更新。进入21世纪，学界更加融通地处理《金瓶梅》的作者问题。学者们认识到，《金瓶梅》的作者、成书时代等问题虽然非常关键，但是，如果在研究中无法形成定论，可以暂时搁置争端，转而从其他视角观照《金瓶梅》。在这10年间，面对80年代以来引进的各种方法，学者理解得更为透彻，运用得更为娴熟，视角更为多元化，对相关问题的分析也更加细致深入。如学者从宗教意识、哲学意识、空间意识、消费文化等角度着手展开对《金瓶梅》的研究，也有学者剖析《金瓶梅》中的梦境或死亡意识、小说中俗语或谚语的文化蕴含、小说叙

① 张国星：《性·人物·审美——〈金瓶梅〉谈片》，载盛源、北婴选编《名家解读〈金瓶梅〉》，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46页，第247页。

② 王彪：《作为叙述视角与叙述动力的性描写——〈金瓶梅〉性描写的叙事功能及审美评价》，载《社会科学战线》1994年第2期。

事技巧等。另外,也有更多的学者从语言学的视角研究《金瓶梅》。如,剖析《金瓶梅》中的虚词、人称代词、叠音动词、句末助词、动态助词、前缀词、物量词等,考察《金瓶梅》中的判断句、“被”字句、“把”字句,以及《金瓶梅》中特有的句式结构。在《金瓶梅》研究异常繁盛之时,也有学者对《金瓶梅》的研究方法进行总结和反思,并进一步更新研究观念。张进德的《〈金瓶梅〉研究的现状与面临的问题》回顾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金瓶梅》研究。张进德指出,《金瓶梅》研究取得了丰厚的成果,但也存在问题,如“选题重复,论述平庸的垃圾文章大量存在,造成了研究中的泡沫现象”^①。也有学者积极探寻全新的治学理念,以推进《金瓶梅》研究。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陈文新。陈文新坚持会通古今,他既不排除现代的文学概念,也尊重本民族传统的文学观念,延续和发展了中国本土的文学观念、学术理念。他的《人情小说审美规范的确立》从辨体着手将《金瓶梅》与《莺莺传》等文言小说纳入同一个研究视域,剖析《金瓶梅》的内容、题材、体式、美学品格之间的辩证关联,梳理了中国古代人情小说的发展流程,并进而还原了文言小说与白话小说并存、共生的关系。《人情小说审美规范的确立》一文标志着《金瓶梅》研究界由大规模引入西方理论转而开始理解并接纳中国本土的学术理论。该文的出现也表明,学者开始转变治学观念,探寻中国文学发展的内在逻辑理路。

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港、台地区以及国外学者与中国大陆的学者相互呼应,共同推动金学的发展。中国港、台地区以梅节为代表,日本以荒木猛为代表,西方则以韩南、浦安迪等学者为核心,这些学者在《金瓶梅》研究方面取得了丰厚的成果。有关《金瓶梅》研究的国际学术研讨活动也蓬勃展开。如,1983年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召开了《金瓶梅》国际学术研讨会,2009年国际金瓶梅研究会在美国成立,日本、韩国也举办了多次《金瓶梅》国际学术研讨会。

总体来看,在金学发展的百年中,学者的研究方法由重外部研究

^① 张进德:《〈金瓶梅〉研究的现状与面临的问题》,载《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

逐渐转向重文本细读、重小说流派的内部剖析，研究范式由传统治学精要、简明的评点转向现代治学细致、深入的推察，治学观念由注重静态的呈现转向动态的考量。百年来，各时代、各地域学者的共同努力，推动了《金瓶梅》研究的繁荣。

二

百年来，国内外学者对《金瓶梅》研究，大体可分为三类：文献研究、文学研究、文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研究。这三种研究类型贯穿了金学百年的始终，但不同时代各有侧重。

1. 文献研究

《金瓶梅》的文献研究包括对作者的考证、版本研究，以及相关文献的整理与汇编等。20 世纪，《金瓶梅》的文献研究是学界关注的重心；进入 21 世纪，文献研究的热度渐渐退却。

《金瓶梅》的作者是学界争论不休的话题。清人提出王世贞说，被广泛接受。进入 20 世纪，鲁迅、吴晗、郑振铎、姚灵犀等人否定王世贞说，但是，《金瓶梅》的作者究竟是谁，学界并没有给出确定的答案。20 世纪中期，学界提出，《金瓶梅》可能并非文人的独立创作。冯沅君在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提出这个观点后，到了 50 年代，潘开沛撰文再倡“集体创作说”，引发与徐梦湘的学术论争。到了 80 年代，朱星发表一系列论文，重新考证《金瓶梅》的作者是王世贞，王汝梅、周钧韬等一批学者撰文支持“王世贞说”。但是，这一观点也遭到部分学者的反对，各家纷纷提出自己的看法，主要有徐朔方、吴晓玲、卜键、王利器等的李开先说，黄霖的屠隆说，张远芬的贾三近说，鲁歌、马征的王稚登说，吴红、胡邦炜的冯梦龙说，美国学者芮效卫的汤显祖说。另外，也有学者提出徐渭、唐顺之、李贽、冯惟敏、卢楠、沈德符、梅国祯门客、丁耀亢、陶望龄、贾梦龙、谢榛、田艺蘅、王世贞门人等诸多假说。从类型上看，关于《金瓶梅》作者的诸多论争大体分为三种：（一）《金瓶梅》是集体创作，还是个人创作；（二）作者是大名士，还是中下层文人；（三）作者是北方人，还是南方人。进入 21 世纪，也有学者提出，探究《金瓶梅》的